

# 儿时取暖那些事

□贺东杰

吃穿备齐,取暖更是操心事。那时冬天特别冷,可偏偏又缺煤少柴,取暖成了棘手的大问题。

农村老家烧不起煤,取暖全靠烧炕,当时的房屋窄小低矮,绝大多数是外砖内坯的“戳斗墙”,倒是有利于保暖,一间房子半间炕,炕烧热之后满屋子热,效果还是不错的。做饭的灶火膛连着炕,白天做饭时炕上多少有点热乎气,到了晚上才舍得打开专门烧炕的炕洞子烧炕。

烧炕需要柴火,主要是庄稼秸秆,可庄稼打不了多少,秸秆也不够烧,于是家家各显神通:夏秋时节多打些草,晒干备用;收了秋地里的栅头就是庄稼根部那部分一个不留,刨出来;树叶落了,用耙子搂到筐头里;西北风大作,顶着风把刮下的干树枝捡回家,出门必得要背上个筐头,生怕拾不着柴火。

秋冬时节,拿上耙子去搂柴火是许多孩子的功课,漫注野地里来来回回拉着耙子,留麦地、树行子、道沟、大窑坑、坟塄子……没有去不到的地方,各种手段用尽,把地里拾掇的连根草刺都见不着,为了一丝温暖与寒冷苦苦争斗着。打开炕洞子,把一切能烧的塞到里面,只为求得一夜温暖。大炕都是土坯盘的,虽说升温慢,可保温时间也长。窗外寒风呼啸,此时在炕头上或坐或躺,身子底下挺热,甚至有点烫得慌,可真是享受啊!热炕对腰腿疼还有缓解功效,对劳累的父老来说就是他们休

憩的圣地,“二亩地,一头牛,老婆孩子热炕头”就是最理想的生活写照。可这炕到后半夜就会凉下来,尤其是炕梢上,到早晨只觉得冰凉,鼻子尖更是冻得不行,手都不敢往外伸,就想躺在被窝里。

县城里条件好些,烧煤球炉子取暖,在天冷之前就摇煤球,搪炉子,打烟筒,做好准备,还要把窗户用塑料布封上,防风保暖。我上初中那会儿就熟练掌握了摇煤球的技艺,如今这手艺没了用武之地,眼瞅着就失传了。说是烧煤,那煤球得数着烧,哪舍得往里边多填啊!炉子里平时有十几个煤球,烧水炒菜做饭取暖都靠它。也就炉子周围有点热气,屋里还是冷冰冰的。烧过的煤球还得一一扒拉个遍,没烧尽的煤核还得拣出来。我们还经常去拾煤渣,看人家把炉灰倒出来,也顾不得烫,顾不得脏,紧拿钩子扒拉,只为拾得一星半点没烧透的煤渣。

一到晚上,家人就爱围在炉子边,一边烤手一边鼓捣些美食。在炉火上烧根粉条,粉条遇火膨胀,酥脆酥脆的,或者烤馒头片窝头片,焦黄干脆,很是解馋。在炉盘上放上几颗枣几粒花生,或者在炉壁上贴山药片,一会儿工夫就烤熟了,缕缕香气溢满全屋。那种大肚子铸铁炉子的炉膛里还能烤山药,头天晚上放进去,第二天早晨就能吃上,真香啊!

现在想起来很有意思,可当时一填煤球一捅炉子,一屋子尘土乱飞。

另外还老担心中煤气,一冬天都小心谨慎,提心吊胆,睡觉前得仔细检查一遍才放心。封上火,屋里很快就冷下来,一钻被窝,冰凉冰凉的,临睡觉都先在被子上坐会儿,捂得被子多少有了点热气再钻进去。妈妈为了让我们暖和些,先用输液瓶子灌上热水塞到被窝里,后来用上了胶皮暖水袋,一钻被窝,那幸福感啊就甭提了,可这东西热量有限,只是一时之热。为了抵抗严寒只能加厚被子,再盖上一床压风被子,棉袄棉裤放在两床被子中间,为的是早晨穿时暖和些。想想这被窝有多沉吧,睡一宿觉压着,浑身很累。可这丝毫不妨碍被窝成为人们的最爱,毕竟它是最温暖的地方。

后来家里用上了土暖气,盘个扫地的炉子,每个屋里装上几片暖气片,取暖有了重大进步。再后来取暖做饭分开,取暖用专烧煤块的采暖炉,屋里的温度有了进一步提高,可仍没有改变脏与累的境地,需要拉煤、卸煤、砸煤,把煤一筐筐填进炉子,再把炉灰一筐筐背出去。烧炉子取暖还是个累差事,我和老伴刚结婚时烧煤取暖,每天全副武装,戴着帽子、口罩,穿着大褂生火、添煤、掏炉灰、封炉子……那脏劲烧过炉子的人都不能忘怀。

烧了一年我们就痛下决心,借账也要买集体供暖的房子。机缘巧合,时间不长我们就实现了梦想,从此过冬取暖发生了质的变化。百姓能否温暖过冬是衡量幸福生活的重要指标,现在无论城乡,取暖条件已是大大改善。

## 小时候的收音机

□黄建文

我小时候非常喜欢听收音机。

那时候,大妈家有一台小收音机,每天放学后,我都会跑到她家,和两个哥哥一起听评书。《西游记》《赵匡胤演义》《百年风云》,一部部经典评书伴我度过了美好的童年。

看我这么痴迷听收音机,8岁那年,爸爸从天津出差时给我带回来一台,每天晚上我都搂在被窝里睡觉。有一天,3岁的妹妹不小心把我心爱的收音机摔坏了,我心疼得大哭了一场。有好几次,我梦到收音机修好了,津津有味地听着单田芳的评书,听得正入迷时被妈妈叫醒了。我开始幻想,什么时候我才能重新拥有一台新收音机啊!

上高中后我迷恋上了足球。为了听体育新闻和足球比赛,我用一个星期的生活费在街边小家电摊上买了一台小收音机。1997年世界杯预选赛,我和同桌拿着收音机在操场上游荡,就为了听中国队的比赛。那段“听球”的日子至今难忘。

上大学后,因为有英语听力课,收音机成了必备工具。大二那年,我用给校报写稿挣的人生第一笔稿费买了一台数码调频收音机。那台收音机能够自动开关机,20多年前已经算是很高级了。大四那年寒假,教电子课的老师给我们留了一个作业:用现成的元器件组装一台收音机。晚上,我边看电路图边用电烙铁在电路板上焊接,忙碌了两个晚上,我亲手组装的收音机终于大功告成。

因为浓浓的收音机情结,大学时代大部分业余时间我都是在学校广播台度过的。在那里,我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,并亲手创办了一档体育节目。每个周五的黄昏,在农大校园的某个角落,我都会静静地听自己写的体育评论,如同儿时听评书那样入迷。

大学毕业后我当了一名体育记者,由于工作太忙,听收音机竟然变成了一种奢望。我从网上下载了一款收音机的软件,可以听到全国各地的广播节目,后来是智能手机听广播,但怎么也找不到小时候的感觉了。

听收音机的日子已经远去,一如岁月匆匆流逝,了无痕迹,只有躺在抽屉里的那几个旧收音机偶尔还能唤起我的回忆。

## 坐着“二等车”回老家

□白国斌

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,农村交通极不方便,不通公交车,公社所在地也没有停车点。人们出行基本上是步行,条件好的还能骑个自行车。那时的自行车是稀罕物,一般人家几年也攒不够一辆车钱。即使攒够了钱,没有自行车票(计划经济时期的购车许可证)也买不上。

“二等车”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城乡的一种代步工具,通常是指自行车载客。载客“二等车”由自行车和简易车座组成。自行车多为“二八”型加重车,起码也得是个“水管架”,也有个别的普通型自行车在载物架上加两根立柱,来增加载重量和安全性。因为农村人弄不到自行车票,他们自攒的“水管架”自行车较多。简易车座是在自行车载物架上铺一块木板,用螺丝固定好,上面再垫一块棉垫。有的在载物架外侧绑一根竖起的木棍,让乘客当扶手,使乘客坐得稳当,增加安全性。自行车后轮外侧拴一个柳条筐,存放一些简单的行李。前面大梁上绑个车兜,兜里放一些食物、水、打气筒、易损件及维修工具等。车主一般是年

轻力壮之人,时速可达15-20公里。“二等车”早出晚归,大都集聚在火车站、汽车站点待雇,为不通车或没赶上客运车的人提供方便。

1968年冬天,我曾乘坐“二等车”回老家。那时我还在天津上大学,乘坐的火车正点是15点多到清风店车站,不知什么原因,火车晚点了,天黑后才到站。原来白天我都是步行回家,这次因天黑,社会治安又不好,所以准备租车回家。出火车站,迎面有几个农民走过来问:“到哪儿去?”“到南支合。”一个老农说:“坐我的车吧,小驴车,两块钱。”另一个推着自行车的年轻人说:“我这是二等车,方便快捷,只要一块钱,来吧!坐我的车。”

二等车是加重自行车,有车铃、车闸、车灯,比较安全,价格便宜,速度也快,我就选择了“二等车”。车主迅速地把行李捆绑在载物架的外侧,然后把我扶上座,打开车灯,笑着说:“坐稳了,开车了。”他使劲向前推自行车,达到一定速度后,右腿跨过前横梁上车,开始骑行。一骑上车,车主就加快了速度,一霎时,我感到夜风擦身而过的

寒冷。回家路大多是乡间土路,坑坑洼洼,高低不平,车子一颠一颠的,我坐在后面一跳一跳的。我一手抓紧车座,一手抱住车主的腰部,还是不断上下起伏,摇摆不停。

路好走时我和他也唠唠嗑。他说他蹬“二等车”是合法的。那时的生产队一个工只有两三毛钱,骑“二等车”虽然辛苦,但收入比大田出工的要好得多。只要能每天上交生产队块儿八毛钱,就能开证明信,便有了合法身份。也有人利用业余时间用自行车载客,凭力气挣个油盐钱。彼时天已黑透,我根本看不清道路,只见一束灯光在田野里扭动,只感觉自己在夜风中滑翔。现在回想起来真有点后怕,因为道路凹凸不平,两旁还有沟,夜间行车,稍不注意掉到沟里就麻烦了。但当时年轻的我却没有一丝的担忧,可能是对车主师傅的信任吧。

大约半个多小时就到我们村了,车主热情地推着行李把我送到家。付了钱,我对他说了声“谢谢”,他回道:“不客气!有事说话。”转身便消失在漆黑的夜色中。